

史志琼崖

【编者按】

2026年9月10日是我国第四十二个教师节，主题是“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，共筑尊师重教风尚”。明清时期，海南的科举成就在古代教育史上达到了巅峰，这离不开由来已久的尊师重教传统，也与那一位位具备教育家精神的古代名师息息相关。

## 慧眼识才 学问广博 不拘小节 海南古代名师群像

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耿

### 慧眼识才

纪纲正、王承烈和云茂琦

明清时期，海南有实力的名师不在少数，然而有个性且能名垂青史的不多。他们当中，有的是进士、举人，功名赫赫，有的只是贡生、秀才，却能名扬一方，造福乡闾；他们当中，有的独具慧眼，有的学识渊博，有的不拘小节……

明代的琼州，文教兴盛，人才辈出，以琼山、文昌为代表的琼北地区，自不待言，琼南的崖州地区，也不遑多让。

当时，崖州有位名师纪纲正，自号“东崖”，其学生钟芳（1476—1544）在《东崖先生纪公墓志铭》一文中称“崖之学者多出其门”，可见纪纲正在崖州一带的影响力。年轻时的纪纲正才学过人，文辞华美，言论勃发，崖州长官对其很是器重，他也认为自己中举、登科是唾手可得的的事情。谁料乡试屡屡败北，又遭到妒忌者的挤兑，也是慨然归家，专注于读书和讲学，为家乡教书育人。

琼台师守李某知道纪纲正的大名后，一度重金聘请他到府城教育自己的子女。纪纲正上门后，不但重视教授学问，还十分注重培养礼节，且不急功近利，“先礼节而后文艺，务敦本实而不急其名”，提倡“素质教育”，李某于是对他礼待有加。

钟芳于弘治十四年（1501年）考中举人第二名，正德三年（1508年）考取进士二甲第二名，学问与政绩并重，被誉为“岭海巨儒”。钟芳的成功离不开个人的努力，但也离不开名师的点拨和赐教。

从他悼念恩师的多篇文章中，可知纪纲正还是一位善于赏识和激励学生的好师长。钟芳记得，每当自己写了文章，纪纲正看后都会加以赞许和肯定，让钟芳倍感自信；若干年后，追思恩师，他又深感自己的“成功”算起来只不过是比纪纲正幸运罢了，不敢忘记恩师的功德。

钟芳曾经感叹，崖州距离京师一万余里，人才稀少，想找到对自己学业有所帮助的师长和朋友，极其困难。足见纪纲正在彼时的崖州，当属凤毛麟角的良师益友。钟芳在《祭纪东崖文》中，对纪纲正的评价很高：“先生积学渊宏，秉心刚毅。怀玉不售，卒老遐荒。”并对纪纲正的苦心栽培，感恩不已，“每阅鄙文，误蒙奖许。岂惟成物之效，实荷知己之明。兹叨宠荣，敢忘攸自？”从中也可以看出，纪纲正还是一位善于赏识和激励学生的好师长。

顺便一提，赏识钟芳的还有位弘治九年（1496年）上任的广东提学金事——宋端仪，《琼州府志》称他“崇正学，严考课，教人必先表率”，而且因材施教，善于发现人才。有人曾问他：广东谁将成为解元？他只说了崖州的钟芳和琼山的张世衡。弘治十四年（1501年）乡试，张世衡果然是第一名举人，钟芳则是亚元；正德三年（1508年），他们又同登进士榜。

我国古代书院的掌教（也叫山长、院长），一般由本地德才兼备的举人或进士担任，他们要么在备考进士或等待任命时，要么是致仕还乡或辞官归里后，要么是父母亡故回乡守丧时，被官方或书院所聘。他们当中，不乏慧眼识才的伯乐。

清代琼山举人王承烈放弃继续考进士后，在雁峰书院和琼台书院执教20余年，将他的余生都献给了乡土教育事业，直到道光丁亥年（1827年）十二月去世。在府城的这两所书院掌教期间，从游的学生遍及海南当时的“三州十县”，大多是已经成名之士，“远近从游多知名士，乡会所取皆出其门”，当时海南考中举人、进士的，几乎都是王承烈的学生。道光戊子年（1828年）秋天，广东乡试揭榜，定安学子叶联辉名列第二——亚元；道光二十年（1840年），文昌士子韩锦中考中进士。而早在他们20岁的时候，王承烈就已经断言这两位学生将来必能成就功名。

文昌进士云茂琦（1790—1849）晚年主讲琼台书院时，从游者都是一众后起之秀，琼山士子王星鹏每完成一篇艺文，都优于同窗学友，云茂琦大为叹赏，称他的才学在其族弟云茂济之上。云茂琦在晚清琼人眼中是“一代宗匠”，一般不轻易期许别人，唯独认为王星鹏和云茂济是“远到之器”。

无独有偶，1850年至1854年间任职的巡道江国霖来琼视察时，也拔取王星鹏为第一，将他与云茂济并称为“海外二士”。结果是：云茂济后来先后考中举人和进士，当了县令，49岁死于任上；王星鹏连续15次参加乡试却未能中举，人称“才高命蹇”，后来以教书为业，育人无数，80岁终老。

### 学问广博

赵谦、符绪和周其焜

明初琼山教谕赵谦堪称“大师级”名师。洪武十二年（1379年），朱元璋命词臣纂修《正韵》，赵谦应聘入京，那些老臣觉得他年少，将其黜为国子监典簿，当时的著名学士宋濂是《正韵》总裁，也只能叹息而无法留下赵谦。第二年，他因与同僚议事不合而被罢，于是放歌东归，回老家勤力著述。他在家乡筑起考古台，撰述《六书本义》。

洪武二十二年（1389年），朝廷搜罗遗落在民间的贤人，赵谦再次被起用，朱元璋下旨让他出任教官。翰林院学士解缙则建议赵谦“施教化于蛮夷万里之远”，他便选了琼山教谕一职。在琼山，赵谦慨然以当地文教为己任，连那些将门子弟和持刀弄枪的蛮夷之徒，也懂得向学和慕义，更有从岛外来跟随赵谦读书的。

赵谦于洪武二十八年（1395年）病故，解缙还为赵谦撰写了墓志铭。后来，琼州先贤丘潜、唐胄、海瑞等人曾经以撰文、修墓的方式，对赵谦的贡献予以肯定。

已故海南文史专家王昶曾说过，明代海南之所以人才济济，有“海滨邹鲁”的美誉，是因为朱元璋重视对海南的开发和教化，明代初年就有赵谦这样出类拔萃的教官来琼执教，对海南教育的积极影响可想而知。

据民国《感恩县志》记载，符绪是感恩县居龙村（今东方市八所镇居龙村）人士，自幼聪颖过人，五经烂熟于心，每次下笔写作都比年长的稍胜一筹。十一岁时，符绪到琼州府城参加考试，知府很欣赏他，但担心少年得志会误了他的大好前程，便奖励他一批书籍，劝戒符绪回家勤学。

三年后，符绪再次报考五经，被擢为琼州府岁贡，两次参加贡院考试都是第一名，得以在府学里接受免费教育，由官方提供食宿。当时的广东督学傅棠一度给他颁发奖牌：“琼南隽士，海外荣之。”于是，符绪的学问更加广博，声名越发远扬，连定安探花张岳松都请他教子。

符绪还多次掌教感恩县九龙书院。

后来，符绪以“明经”特授广东梅州丰顺县训导，任职五年，以清白自持，行为端正，是读书人的模范。光绪六年（1880年），符绪卒于任上，享年78岁，“士林悲之”，丰顺知县赵培兰和各位生员捐资将他归葬琼州。

过去，在官学担任教职，在书院里教书的多是进士、举人出身，再不济也是贡生，也有个别因为种种原因未考取任何功名者。

清代，琼山县员山里（今海口市新坡镇文山村）的周其焜，便是一名科场不得志的琼州府学廪生，却因“博学通经，众推宿儒”，而“主讲尚友书院，为多士楷模，门多魔士，人欽仰之”。民国《琼山县志》对周其焜的记载只有寥寥数语，生卒年月也不详，却让后人感慨，即使在科举时代未能入仕，但只要真有真才实学，还是会得到社会认可，不会埋没其才学。

### 不拘小节

谢宝和杜应清

在海南教育史上，不得不提一个极具个性的人物——谢宝。清代康熙四十七年（1708年），谢宝考中举人，雍正二年（1724年）中进士，赴任广东肇庆府学教授。据《广东通志》记载，谢宝生性旷达，不拘小节，任上与上司观点不同（据说是上司经常干预教学），便愤然弃官回琼，在琼山、文昌等地教书，学生中有成就的很多，文昌进士张日叟、琼山举人冯洸都是他的门生。

谢宝的晚年基本上都在琼台书院度过。“树老花偏嫩，春融枝亦樛。客窗幽静处，明月与绸缪。”诗言志，表达了他全心投入教育事业，以书院为家，以培育弟子为己任的愿望。今天的“琼台书院”里，还珍藏着谢宝用过的各类书籍，以及他的亲笔题诗。

清代中期琼山人杜应清，文章写得清新俊逸，乾隆壬子年（1792年）考中举人后，不愿出仕，而是先后主讲于本县的雁峰书院和定安的尚友书院，门下多是名士和才俊。杜应清晚年时，吏部多次行文催他任职，他都没有赴任，直到改任他为国子监主簿，他才出任，毕竟这与教书育人有关。

《琼山县志》称杜应清“为人不拘绳尺而平坦乐易，领其教者蔼然如坐春风中”，看来他不仅学识出众，而且待人平易，学生在他面前如沐春风，学得自在松弛。

史籍典录

## 古人看天“硬”科技

■ 马庆民

我国最早的天象观察，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。《尚书》已记载公元前2137年掌管天文的羲和其人其事。从汉初到1785年，我国共记录有日食925次，月食574次，堪称世界之最。古人看天，有着实打实的科技。

东汉的张衡创制了世界上第一架利用水作为动力的浑象（一种表现天体运动的演示仪器，类似现代的天球仪）。这架仪器的主体是一个直径四尺六寸的大圆球，球上画有二十八宿、中外星官、赤道、黄道、北极常显圈、南极常隐圈、二十四节气点，整个球安装在南北极轴上，可以绕轴旋转。

张衡还在浑象上装了一套齿轮机械传动装置，利用漏壶中流出的水，推动整个浑象均匀地与天球做同步运转。这样一来，昼夜交替，星辰出没就和实际天象相一致了。

除此之外，张衡还给它配了个“自动日历”，叫瑞轮蓂莢。传说尧帝前有种神草“蓂莢”，每月初一长一片叶子，十五后每天落一片。张衡就用齿轮凸轮（关爻）做了个机械板，把它接在浑天仪底下，随着月亮盈亏，叶子每天自动开落一片——这才是真正的“看叶子就知道几号”，比翻日历浪漫多了。

汉代以后，中国测量天体的仪器在此基础上不断改进发展。

北宋元祐七年，六十二岁的苏颂和五十三岁的韩公廉，在汴京的文明殿东鼓楼下立起了一座十二米高的木楼。它是一座水运仪象台，集观测、演示、报时于一体。仪象台靠水力驱动，楼顶的板子可以开合——这是世界上第一座有活动屋顶的天文台，比欧洲早了好几百年。

整个水运仪象台以漏壶中的水为驱动力，通过一套传动装置和一个机轮联结在一起，与天球同步运转，逼真自动地演示了天象的变化。最神奇的是楼里藏着一套“天衡擒纵器”，就像钟表的心脏，每隔一阵“咯噔”一跳，控制着整个系统的节奏。

英国人李约瑟后来研究天衡擒纵器的秘密，说这比欧洲同类技术早六百年。此时，西方人才知道十一世纪的中国已经有了一座天文钟。

当然，苏颂并不是凭空起高楼。在他之前，有个叫张思训的四川人，已经造过一座太平浑仪。它高四米多，“规天矩地”，内部齿轮咬合精密，机械人按时辰轮流出来报时，左手摇铃，右手扣钟，中间击鼓，一套自动化流程下来，满朝文武都看呆了眼。

但张思训遇到了一个最大的麻烦——水力驱动的仪器一结冰就罢工，在冬天无法使用。

张思训琢磨来琢磨去，最终想到了一个解决的法子：用水银。《宋史·天文志》记载：“今以水银代之，则无差失。”简单的十三个字，背后却是一个工匠对物理性质的精准拿捏。

苏颂的水运仪象台在张思训的基础上，又进了一步。水运仪象台有三层：顶层搁浑仪，专门看星星，屋顶能开合；中层放浑象，是个大圆球，人可以钻进去，能看见满天星斗；底层是动力间，五层木阁里藏着一百六十多个小木人，到点就敲锣打鼓报时。

整个装置高十二米，宽七米，像个木头搭的巨人，站在汴京城的晨光里，咯吱咯吱地转着，把日月星辰的运行一五一十地展现出来。

元朝时，有个叫郭守敬的邢台人，从小就爱鼓捣天文仪器。他检视了司天台里那台北宋留下的浑仪，发现南北极的度数差了将近四度，石圭也歪了。于是他干脆推倒重来，一口气造了二十多种新仪器，其中最硬核的，叫简仪（一种测量天体位置的仪器）。

郭守敬把传统浑仪里那些互相嵌套的环拆开，分成赤道和地平两套独立的系统，视野一下子开阔了。他还给简仪装了个滚柱轴承。

简仪的创制，是中国天文仪器制造史上的一大飞跃，是当时世界上的一项先进技术。欧洲直到三百多年后的1598年才由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发明与之类似的装置。

另一个叫仰仪（大型铜质天文观测仪器），是一个半圆形的铜球，直径三米，内壁刻着经纬网。太阳光从小孔射进去，在球内壁投下一个倒影——观测者背对着太阳看，眼睛不晃，日食的时刻、方位、食分，一清二楚。这架仪器还能观测月球的位置和月食情况，被称为“日食观测工具的鼻祖”。

还有一个最绝的，叫景符（高表辅助仪器），一块小小的铜片，中间开个小孔，利用小孔成像的原理，把四丈高表投下的日影精确到两毫米以内。2021年，河南省科技馆新馆建成100米圭表塔，就是沿用郭守敬的高表设计原理，并配备景符仪器。

有了这些硬家伙，郭守敬奏请忽必烈，在全国设二十七处观测站，东到高丽，西到滇池，南到海南岛，北到贝加尔湖，同一时间测日影、测北极星高度。数据汇到大都，郭守敬带着王恂等人算了一年又一年，最后拿出一部《授时历》。

文史荟

海口市琼台书院里的谢宝雕像。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耿 摄

南京雨花泉的赵谦雕像。 资料图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耿 翻拍琼台师范学院博物馆里的王承烈画像。